

清代巴县档案编研工作概述

刘 君

四川巴县档案是我国现存时间较长(1751—1911年)、内容较为完整、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卷帙最为浩繁(共计113000多卷)的清代县级政权档案。因此,自从50年代该档案被发现以来,一直受到各级领导和学术界的重视与关注。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开放历史档案以来,四川省档案馆利用现有条件,较为充分地开发了这部分档案。当然,由于各种原因的限制,也存在不尽人意之处。下面拟就清代巴县档案利用、编辑、研究的现状作一概述。

一

清代巴县档案自1953年在巴县乡村一座破庙发现以后,即运回重庆由西南博物院保管。该院撤销后移交四川省博物馆,暂存四川大学。这段时期,川大历史系组织人力物力对其进行了初步整理,并开始了史料编辑与研究。至1965年,四川省档案馆将它收回,重新区分整理。特别是1978年以来,省馆花费大量人力财力,对其进行了整理、缩微、裱糊、编辑,巴县档案才得以受到真正的重视和利用,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清代巴县档案在编史修志,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方面发挥了作用。早在民国时期,向楚等人撰修《巴县志》时就利用了巴县衙门档案。在近年编史修志热潮中,由于档案形成的地域原因,重庆市有关撰修部门志、县志的同志更是络绎不绝地来馆,大量查阅利用了这部份档案。同时,中外许多专家学者也来馆查阅有关档案。据统计,即使在编史修志热潮消退之后的1992年,仍有不少中外学者来馆查阅档案。

二

50年代中叶,四川大学历史系在初步整理分类的同时,即开始了编辑公布档案史料的工作。他们相继发表了《刘仪顺自述》《自立军全党名单》、《四川义和团灭清剿洋兴汉揭牒》、《余栋臣与四川农民运动史料补辑》等,供学术界研究之用。1961年,出版了《四川人民反帝斗争档案资料》。此书共分:“四川教案档案资料选辑”、“四川人民收回重庆王家沱日租界斗争档案资料选辑”、“四川人民抵制日货斗争档案资料选辑”三个专题。

“文革”时期,清代巴县档案编辑出版工作处于停滞状态。直到1980年,省档案馆才又开始了清代巴县档案的编辑工作。在整个80年代,相继出版了《四川保路运动档案选编》、《四川教案与义和拳档案》。《四川档案史料》上,刊发了有关清代巴县档案的一些专题。同时,为了尽快地向社会披露这部分档案,省档案馆还采取与学术界合作的形式,编辑了数种档案资料。下面择要介绍。

四川保路运动在辛亥革命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为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四川省档案馆编辑了《四川保路运动档案选编》,全书收入123题计259件档案。这本史料的出版,为学

术界研究保路运动史提供了新的重要史料。该选编还编译了部分清代英法教会和重庆海关(英)代理税务局有关保路运动的书信,将它与清代官方档案对勘,颇具研究价值。

四川人民反对外国教会势力的斗争,在中国近代反帝斗争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一页。四川大学历史系从巴县档案中精挑细选,并对其原编辑出版的有关教案史料校订舛错,一并编成《四川教案与义和拳档案》。由于《选编》的完整性及其重要价值,该书获得了四川省政府颁发的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中国档案学会颁发的档案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是四川档案界与史学界合作的成果。全书分上下两册。上册为经济部分,分为农业生产和土地关系、工商业两个部分。下册分财政、政治概况、平定少数民族暴动三部分。该书收录了乾隆二十二年(1757)至道光三十年(1850)长达近百年的档案,比较系统全面地反映了此时期政治、经济概况,从地方县级政权这个角度为研究清朝由盛而衰的历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翔实史料。

为了更全面地向学术界展示清代巴县档案的全貌,四川省档案馆决定按朝代,以房设类,以年为序,编辑《清代巴县档案汇编》。兹以《乾隆卷》为例,该书按吏、户、礼、兵、刑、工六房设类,各房之中再以问题设目,以具文时间先后为序编排。由于乾隆中叶巴县衙门曾数次发生火灾,因此乾隆十七年以前档案无一存世,乾隆十七年以后的档案也有所毁损,如吏房档案原缺。该书户房包括赋税、田土买卖,礼房有书院、庙宇、打会,兵房有军需优抚、过境迎送。工房与刑房档案最多,内容较为完整,刑房有人犯管理、命案、盗匪、欺诈、拐卖人口、风化、赌博、租佃、寺庙、家族、乡保、差役、洋教等项,工房内容有商行、工矿、地产、城建、禁私、运输。

三

在整理编辑档案史料的同时,清代巴县档案的研究工作也开始了。目前,已发表专门介绍与研究清代巴县档案的文章约30余篇。在各种论著特别是有关清代四川地方史方面的著作,利用巴县档案的更是不计其数。这些论文的内容大体可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1. 清代巴县档案内容介绍。比较重要的文章有伍仕谦的《一座内容丰富的文献宝库——巴县档案》(《文献》第1辑)、《关于巴县档案》(《中国史研究动态》1979年第4期),张仲仁、李荣忠的《历史的瑰珍——清代四川巴县档案》(《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

2. 清代巴县衙门文书、差役研究。张永海的《巴县衙门的文书档案工作》(《档案学通讯》1983年2—3期)以档案为依据,否定了传统“六房”之说,提出了从乾隆中叶直至清末,巴县衙门除了一般学术界认同的吏、户、礼、兵、刑、工六房之外,尚有盐、仓、承发、柬房之设,共计10房;并从承办文书机构和人员、文书处理制度、公文传递、文书档案管理制度方面,探讨了巴县衙门的文书档案工作,可补清代州县衙门文书档案管理工作研究之不足。李荣忠的《清代巴县衙门书吏与差役》(《历史档案》1989年第1期),则从书差的角度入手,对清代所谓“与胥吏共天下”之说的地方州县书差制度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考察。该文详述了书吏与差役的职掌、员额的设置,特别是搜集了书差经济收入的大量材料,排比出了书差应差办案的各种规费实数,从而回答了以前大批书差人员收入来自何处的的问题,并直接从经济性质方面分析了形成书差积弊的原因。

3. 近代四川人民斗争与外国教会。(四川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林顿、刘君的《清代外

国教会势力述论》，该文根据档案描述了清代四川外国教会势力的发展概况及其种种罪恶活动，为四川教案频繁发生找到了一个答案。冉光荣的《清前期天主教在四川的活动与清政府的查禁》（《社会科学研究》1985年第4期），以巴县档案为例，分析了清前期四川地区天主教秘密传教的基本特点，比较了清政府严禁天主教与中国传统秘密宗教的异同，并认为天主教秘密传教不仅盛行于清前期，即使在取得条约特权的后期也曾采用。

4. 经济史研究。发表较早的是李映发的《清代重庆地区租佃关系中的几个问题》（《历史档案》1985年第1期），作者借与省馆合作编辑巴县档案之机，参证文献史料，对清代前期、中期重庆地区农田租佃关系中押佃作用、地租形态、顶打转租、当出佃转问题作了讨论，最后阐述了租佃关系中的新动向——佃农争夺永佃权的斗争。交通运输方面的代表作有两篇，一篇是张永海的《论清代巴县邮政传递工作》（《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中华书局1986年），另一篇是张永海、刘君的《清代川江铜铅运输简论》（《历史档案》1988年第1期）。前者对清代巴县驿传的设置变迁、邮政传递管理制度、驿递积弊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从中可以了解清代内地州县一般邮政工作；后者则对清朝统治发生过重大影响的滇黔铜铅出入川江的路线、转运组织制度、运输规模与运价、历史作用进行了初步探讨。手工业研究方面是清代巴县档案的一个重要课题。冉光荣的《清前期重庆行会简析》（四川大学历史系编：《徐中舒先生九十寿辰纪念文集》，巴蜀书社1990年），对清前期重庆行会对工商业发展的抑制性作了初步讨论，指出手工业经营者设立行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应付官府浩繁的差役；随着工商业的日益发展，手工业行会也愈为发展，行业分工愈来愈细，帮（会）规日趋严厉，经营产品愈加单一，活动范畴日益狭窄；行会帮规的发达与沉重的官府差务二者相互制约，互为作用，最终成为窒碍工商业向前发展的枷锁。刘君的《清前期巴县城市工商业者差役初探》（《历史档案》1991年第2期）则详细阐述了城市工商业者对官府负担的差役种类、手工业行会应差规则以及办差人员藉差扰害，旨在说明官府差务负担阻碍了城市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与繁荣。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作为清代一个地方政权的档案，开发出了如此之多的信息资源，在利用、编辑、研究方面取得较为显著的成绩，确实令人欣慰和鼓舞。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无论从史料出版还是从史学研究的角度来看，就时间跨度而言，均集中在清朝乾嘉道三朝，以后几朝基本没有涉猎；就使用档案而言，乾嘉道朝档案总计不到35000卷，而咸、同、光、宣四朝档案则有78000多卷。显然，其中还有大潜力可挖，但要在近期内改变这种状况，又殊非易事。这是因为，长期以来清代巴县档案的利用编研工作一直受到一个关键环节的制约，即档案抢救修裱工作。众所周知，巴县档案在被发现之前弃于破庙多年，任凭风吹雨打，虫蛀鼠咬，加之形成年代久远，损坏较为严重，有的已成纸砖，如不加以修裱，根本无法开展利用。10余年来，四川省档案馆为此做出了积极的努力，由于卷帙浩繁，工作量大，任务艰巨，至今虽已完成乾、嘉、道、咸四朝档案近80万张的修裱工作，但这也仅仅完成了约一半的工作量。所以，欲进一步开发巴县档案利用编研工作，档案的抢救修裱工作必须早日完成。